

奖与罚：新闻奖的荣誉域及其荣誉实践

黄月琴 何强

摘要

新闻评奖是新闻行业荣誉生产和分配机制。荣誉涉及到身份、认同和尊重等集体意识问题，因而有一定的共同体边界，形成不同的荣誉域。本文分析了当今新闻界不同荣誉域分立存在的现状，以及围绕中国新闻奖所形成“奖与罚”的差异化荣誉实践话语。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官方荣誉生产对市场与专业新闻社群造成区隔、限制与排斥效应，加深新闻业价值疏离、人才流失和自我耗竭的困境。新闻评奖改革的目标应该致力于扩大对新闻社群的尊重和团结，建立基于“承认”的荣誉共同体。

关键词

荣誉域、新闻奖、荣誉实践、奖励、荣誉共同体

作者简介

黄月琴，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电邮：hbuhyq@126.com。

何强，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电邮：1198557900@qq.com。

本文是湖北大学研究生精品课程建设项目（2015）“政治传播研究”的成果之一。

Reward and Punish: the Honor Worlds and Honor Practices of Journalism Awards

HUANG Yueqin, HE Qiang

Abstract

News awarding is the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honor in journalism. Every honor has certain community boundary because of its distinctiv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status, identification, respect, etc., so different honors necessarily form different honor world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arious honor worlds in Chinese journalism and differential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reward and punish” about “China News Award”.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effect of separation, restriction and rejection acted on the market

and professional news community by the official mechanism of honor production. In addition, this effect deepens the dilemma of value alienation, brain drain and self-depletion in journalism. The reforming is supposed to expand respect and solidarity of the journalism professional community and establish an honor system based on “recognition”.

Keywords

honor worlds, journalism award, honor practices, honor community

Authors

Huang Yueq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Email: hbuhyq@126.com.

He Qiang is a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chool, Hubei University. Email: 1198557900@qq.com.

This paper is supported by the postgraduate high-quality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ject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of Hubei University.

荣誉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 “拥有荣誉意味着有资格获得他人的尊重”(阿皮亚, 2010/2011:13)。荣誉如何被生产出来, 如何兑换和转化, 人们围绕荣誉展开何种话语和行动, 荣誉如何作用于主体的锻造——即荣誉如何被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过程, 构成了荣誉实践。

新闻评奖是新闻行业荣誉生产和分配的机制, 评奖者、评奖标准、评奖程序以及获奖者等构成的一整套荣誉机制, 通过对象征性资源的控制和再生产, 籍之延续和重申价值, 规范新闻实践行为。好的荣誉制度应能筛选出代表最高专业水准的新闻作品, 彰显新闻业的价值标准和专业伦理, 并生产新闻典范。中国新闻业当前的荣誉系统主要由中国新闻奖、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新闻奖以及长江韬奋奖等官方奖项所主导, 这套荣誉体系与宣传性新闻事业相互匹配, 给新闻从业者生产和提供象征资本, 引领行业导向并进行事业控制。

但是随着新闻实践活动的丰富与多元, 这些官方新闻奖项也饱受批评和质疑, 集中在: 新闻作品的评价标准固守于以宣传价值为主, 忽视受众阅读面, 评奖机制的专业性程度不高, 奖项设置僵化和粗略, 前瞻性不够等等(包临轩, 2000; 唐绪军, 2013)。学者黄顺铭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 对官方新闻评奖的社会控制性和获奖机会结构进行研究, 指出现行的评奖制度按照国家支配模式和特殊主义原则来组织实施新闻奖的生产, 又通过双重赞助、推荐单位制度和挂钩制度等基础性规则进行运作, 存在严重的操纵性和不公平性, 不同地区、不同行政层级的媒体荣誉机会差异悬殊, 评奖结果流于“关系游戏”等(黄顺铭, 2013; 黄顺铭, 2014)。

官方新闻奖的根本缺陷在于难以涵盖当前丰富、复杂而多元变迁的专业新闻实践，因而存在封闭与自我窄化的弊病。中国新闻业在九十年代改革以来已经培育出一批以市场与专业导向为主的新闻媒体和新型新闻实践空间。这些新闻组织与新闻人，一方面跟官方奖项保持着相互疏离的关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新的荣誉来体现自己的专业认同、价值与职业尊严。虽然这些组织内部的或称为“民间”的荣誉制造常常难以脱离权力的限制，中国新闻业的荣誉实践却因此变得丰富而多元，并且充满矛盾的张力。因应这种局面，新闻工作者形成了差异性的荣誉话语实践和价值分野。本文以荣誉理论为视角，探析当前中国新闻业不同荣誉域的存在以及新闻工作者的荣誉话语实践现象，并阐述荣誉规则的主导与变迁对新闻业和新闻从业者的影响。

一、荣誉域与荣誉的功能

（一）荣誉域（一）荣誉域

美国学者阿皮亚（Appiah）指出荣誉的形成基于一种公认的规范，也就是荣誉法则（honor code）。荣誉法则规定具有某种社会认同的人如何获得尊重的权利、在什么情况下会失去这种权利、拥有或者失去荣誉将如何导致他人对你的态度改变。在一个共同体内享有相同或相似的价值观和认同规则，就形成了一个“荣誉域”（honor world），这个群体内成员彼此成为荣誉伙伴（阿皮亚，2010/2011）。

荣誉涉及到身份、影响、认同和尊重等社会群体心理机制，因而有一定的文化边界，形成不同的荣誉空间，也即荣誉域。民族、种族、国别、阶级等这些宏观的结构性指标常常规定荣誉的边界，行业、领域、职业也制造不同的荣誉空间。更进一步看，同一职业或行业内部也可能存在不同的荣誉域和荣誉空间。行业内不同的荣誉域的存在，以及彼此之间的区隔、纷争或者较量，彰显行业内组成人员在观念、价值和实践上的差异、分歧和紧张关系，说明这一行业缺乏内在的价值整合与认同，必然存在着非职业性倾向和自我耗竭等严重问题。古语“道不同不相为谋”就体现了荣誉域的分立导致主体话语和行动选择的差别。

基于历史和权力现实，“命令型新闻体制”已形成一套相应的宣传性荣誉体系。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新闻行业以“事业单位、企业制管理”为起点开展了新闻改革实践，市场化办报潮流开拓出新的新闻空间，并衍生出新的价值理想，新闻专业主义在职业意识形态中的浮现，又激发了新闻人不同的荣誉意识和道德勇气。中国新闻业形成价值和利益分化的现实，以宣传为主导、以专业价值为主导和以市场为主导的不同新闻观念及其实践形式同时并存，新闻工作者内部难以形成一个共

享荣誉和价值的职业共同体。象征资源和荣誉规则的不同催生了不同新闻范式的竞争和博弈，业内新闻评价标准和阐述框架出现分化和破碎化，“不同的新闻社群，其说话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生存方式都不一样，甚至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和两个世界”（傅剑锋，2010）。在价值观、伦理和新闻操作等层面的冲突之下，专业价值和市场导向的所谓“体制外”新闻人难以与宣传导向的“体制内”新闻工作者共享荣誉域并形成荣誉伙伴。

这种不同荣誉域的区别，反映在荣誉实践中，是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和专业主义导向的媒体很少参与官方新闻奖项的角逐。这些新闻人对官方荣誉体系表现出疏离、拒绝认同甚至抗拒，他们的荣誉要靠市场业绩、社会评价或者创造新的专业荣誉来体现。而官方新闻评奖时也极少将市场与专业新闻组织及其作品纳入评选和竞争范围，由此自身进一步陷入故步自封和教条僵化的困境，二者几乎互为因果，出现了各不相干、各自划圈子的现象。在当今新闻界，至少存在着官方荣誉域、专业荣誉域和市场荣誉域等几个不同甚至互斥的荣誉空间，运作着不同的新闻生产标准和评价体系，形成不同的价值分野。

尊重和认同是荣誉的核心，“每一种形式的尊重，都是根据某一事实或者关于他人的某些事实，在交往之际给予他人相应的关注与承认。”阿皮亚（2010/2011：14-15）将尊重区分为两种：一种尊重形式是“承认性尊重”，是基于对身份或者职业的尊重，比如社会赋予对记者、警察、教师、医生等公职人员的荣誉和尊重。另一种尊重形式是基于他人成功地达到某种标准，这种尊重称之为“赞美性尊重”，赞美性尊重意味着更多的才能、成就或者贡献。承认性尊重和赞美性尊重都可以借助荣誉法则即得以传播，无须借助权力或道德的力量。

如果把荣誉看做一种奖赏，可区分出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官方荣誉是新闻工作者在组织中保持职业上升的砝码和条件，同时意味着获得生存保障、物质利益与权力资源的可能性，但是却不一定享有新闻共同体普遍的认同和赞美性尊重。而享有专业荣誉的新闻人较多获得业内的认同与公众的赞美性尊重，却很难享有体制内稳固的组织与利益保障。生存理性与价值理性出现了分歧和悖谬的局面，导致整个新闻业荣誉体系的失衡与冲突。

（二）荣誉的功能：奖励与惩罚

荣誉可以兑换为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也往往预示地位提升、发展前景和权力资源的占有。荣誉是竞争性的，也是控制性的。荣誉的主观功能是奖励和激励，但是在客观效果上也往往造成排斥和打压。惩罚与奖励是紧密相连，互为表里的，它们共享心理机制，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构成一对相生相克的关系图式。荣誉还是

实现主体规训的手段,荣誉实践可以编织和固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主导共同体的意识、观念与价值。

1.奖:激励与团结

荣誉是共同体对个人地位或者成就的肯定和褒奖,获奖者享有他人的承认和赞美,并激发共同体的目标感和行为动力。荣誉是组织管理中卓有成效的激励措施。荣誉并非只是事关个人,而是具有公私转换的能力。个人荣誉可以生成典范,因而具有公共性质。典范是承载价值理性的重要装置,以实践可感的形式提供象征资源,荣誉和典范的生产是通过评选、揭晓、公布、颁奖和传播等仪式过程,制造一个时间上和象征空间的共有,供职业群体共同“凝视”(黄月琴,2015)。“凝视”是一种象征行为,借由这种共同关注,制造一个由此及彼、由他人到自我的思想连接通道,形成情感连带和关注机制,生成群体团结和团体成员身份的符号(格尔茨,1973/2008:175;戈夫曼,1959/2008;柯林斯,2004/2009:36)。因此荣誉的制造是共同体信仰的表征,借由荣誉实现共同参与和分享,形成情感激励和精神感召。当荣誉转换为公共规则,就会对共同体甚至社会产生激励、引领和团结的作用,形成良好的道德、风气和公共规范。

2.罚:区隔与排斥

美国教育社会学家艾尔菲·艾恩(1993/2006)指出“奖励和惩罚是一个硬币的不同面”,奖励从本质上来说与惩罚相通,二者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共享相似的心理机制。奖励属于外部动机,是对人行为的一种积极强化。在奖励机制中,奖励者会提出“做此就会得彼”的承诺,但因行为动机不同,行动者会呈现出“如何得到奖励”与“如何完成任务”两条思考与实践路径。由此,当作为外在动机的奖励,没有转化为内在动机,反而消磨和改变内在动机的时候,奖励就变成一种控制和惩罚。心理学研究认为,奖励和惩罚本身都有损于主体的自主、自决需要。艾恩提出的“奖励作为惩罚”的命题就是基于这个道理:获奖者与未获奖者可能都因为外部荣誉和奖励扭曲自己,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荣誉的传统基础是等级制和差异政治(泰勒,1994/2005)。荣誉和奖励的运作具有选择性、排他性和竞争性,少数人得奖而多数人落选的结局,容易使多数人的期待落空,这种内心落差所引发的消极心理,不仅可能破坏人际关系、降低行为的积极性并掩盖问题,而且可能瓦解组织的凝聚力,特别是当荣誉规则不公平、滥用奖励或评奖失当的情况下,奖励的伤害和破坏性比遭受惩罚还要严重(高德胜,2009;兰维,高德胜,1997)。荣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是社会权力运作的产物,

是意识形态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一环。奖励活动本身存在一种二元结构,评奖者与被评奖者之间常常存在着权力关系的不对称和地位级差,评奖主体的观念、意识、情感、价值和主导性往往得以编织其中,对受奖者施展规训和操控。而受奖者也在与外部荣誉的互动实践中展演自己的行动与话语,并进行自我规训。当个体被完全吸纳到奖励体系中时,奖励系统的权力操控性得以遮蔽并完成。

法国思想家福柯(1975/1999)曾将规训建立在分类和区分等次的基础之上,通过这种奖惩的潜在对比,使被规训者从内心产生耻辱和恐慌感,从而修正自我,努力按照标准行事,以期得到他人的承认。荣誉规则对所有人产生规范和压力,如果不按照规则行事,就可能失去荣誉,招致蔑视和排斥,也可能产生自我蔑视和耻辱感。“屈辱让人的脊梁弯曲,让人的目光短浅”(阿皮亚,2010/2011:8)。正是通过骄傲和耻辱、尊重和蔑视这些微小情感压力机制作用,荣誉影响个体的心灵和日常生活,改造其思想和行为,从而锻造着个体的主体性。荣誉制造者因而达到收编个人的组织与社会功能。正因为如此,法国哲学家萨特就曾拒领诺贝尔奖,声称拒绝接受任何荣誉的组织化收编。¹

理解荣誉的最好方法,是观察荣誉在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中的实践和表达(阿皮亚,2010/2011:9)。鉴于微博社交平台在中国的兴起和较长时间的应用,本文首先选取新浪微博作为对象,考察中国新闻从业者在其间关于中国新闻奖的话语表达实践。具体方法是利用新浪微博自设的搜索引擎,以关键词“中国新闻奖”进行检索,检索时间范围为2009年至2015年历年中国新闻奖公布后的一周(如第二十五届中国新闻奖公示时间为2015年8月19日,检索时间段则为2015年8月19日0时至2015年8月25日24时),总共获得521条相关微博。再在其中筛选出身份认证为新闻从业者或虽未认证但身份可确认为新闻从业者的用户,逐条阅读所发表的原创微博和带评论转发的微博(共计124条),进行归类和语义编码。其次,部分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网站栏目、博客自媒体、报刊杂志等发表过对新闻奖的评论,有些新闻从业者还会在记者手记、媒体采访或在“传媒盛典”等场合提及对荣誉体系的认知和看法,本文将这类话语文本也纳入考察范围,共收集到89篇。除此之外,还辅之对部分新闻工作者的访谈材料。以上所得构成本文展开分析的主要语料。

二、“中国新闻奖”的荣誉实践

由中宣部批准设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中国新闻奖”是中国新闻业的“最高奖项”,是维持和重申宣传事业原则的荣誉机制,既赋予新闻人一定

的制度性资本与文化资本，也是主体锻造和象征秩序再生产的工具。对于在“体制内”的新闻从业者来说，主动参与这套荣誉体系当中，服膺于评奖规则既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媒介组织争夺业绩和政治利益的需要。

对于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来说，生存发展和经济效益是第一位的目标，也是衡量媒体成败的标准。由于组织目标的不同、绩效考核体制以及行业的高风险和高流动性，这些新闻工作者对新闻评奖普遍比较淡漠。中国记协在解释“都市类媒体刊播作品在参评作品中所占比重相对较低，获奖比例更低”这一问题时，将原因归结为：“一是初评环节推荐单位不够重视，一些真正优秀的都市类作品没有推荐上来；二是有些都市类媒体报道对于涉及主题宣传、典型宣传等方面弘扬主旋律的优秀作品还比较少；三是一些都市类媒体的负责人和编辑记者对改进推荐中国新闻奖的新措施缺乏了解。”²但是反过来看，官方荣誉系统实际上参与了对这些“媒体市场雇佣者”劳动情境的塑造和建构。因为评奖规则或者“潜规则”本身就构成了一套区隔与排斥机制，不被体制接纳和缺乏制度性资本导致了市场化记者的被贬斥感的产生，降低了记者的尊严和价值感，造成记者的自我认同普遍向下偏移，“新闻民工”的自嘲即是这些记者自我贬斥感的心理映射（赵云泽，2014）。

对于新闻专业主义实践者来说，由于价值理念和操作手法很难与宣传规则合拍，他们的职业荣誉更加游离于官方体系之外，官方新闻奖也很少认同这些媒体的记者和作品。在一个自主意识缺乏、荣誉共识阙如的新闻生态系统中，专业导向的新闻工作者并非依靠制度性资本，而是依据新闻理想或者专业理念勉力前行，但在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实际上又越来越陷入制度“承认”（recognition）匮乏和职业尊严剥夺的处境之中。当专业记者努力践行独立、客观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新闻专业主义价值，却难以将劳动兑换为公平的利益报偿和职业尊严时，也就难以避免在生活世界中的挫败感和无力感。如何持续保持新闻劳动的热情和行动意愿就会成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当记者人到中年，生活压力增大，却仍然缺乏上升空间、尊严感与成就感，生存理性就会压倒价值理性，离职或者转行是多数人的选择（夏倩芳，2013）。他们对待官方奖项所产生的种种消极心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通过对文本的话语分析和解读，本文发现作为国家荣誉体制的中国新闻奖，对部分新闻组织和新闻工作者具有激励作用，但是也使大量新闻工作者产生消极心理。它一方面发挥贯彻宣传事业宗旨、整合行业和锻造记者的功能，一方面又刺激和突显新闻社群内部的价值分裂、认同鸿沟和利益矛盾。具体的话语类型包括：

（一）积极迎合与主动锻造

作为行业最高荣誉的中国新闻奖，它不仅仅为获奖者制造文化资本，也涉及到组织利益分配和政治业绩等现实考量，因而是个人、新闻组织乃至地区宣传领导者激烈争夺的目标。中国新闻奖等官方荣誉因而出现关系运作和功利导向，反过来，评奖规则和结果也会以一种功利化、投机化和“锦标赛”式的方式影响新闻生产实践。许多新闻单位在新闻采写标准上刻意强调以评奖标准为依据，形成从选题导向、采写规范、版面编排、社会反响预测、奖励措施设置到稿件报送的系列操控机制，以此积极锻造获奖作品。

曾有多位中国新闻奖评委透露官方新闻奖的评选“秘籍”，鼓励多生产符合官方标准的新闻精品，加入荣誉“锦标赛”的争夺。比如担任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和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评委的崔某曾结合具体评选实例，归纳中国新闻奖体现的四个导向性：第一，题材重大，新闻性、思想性强，反映时代精神；第二，故事感人、社会反响大的民生作品；第三，深入基层，走转改优秀作品；第四，新闻强报、精品意识强。“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有可能获得中国新闻奖。”³中国有色金属报记者赵某在担任第21届中国新闻奖评选后，给报社同仁交流经验，称其“知道了中国新闻奖评选的条件和中国新闻奖产生的过程，特别是对什么是好新闻、好新闻好在哪里、如何发现和挖掘好新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他在评选观察中形成了一套从采写、编辑、校对、报送等步骤详尽的锻造中国新闻奖流程。⁴一位担任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评委记者在一次交流会上坦陈，中国新闻奖青睐的新闻作品有三个要素：“作品必须围绕全国工作中心，服务大局；作品要能真正体现‘三贴近’原则；创新和特色”⁵，建议要以中国新闻奖评选标准作为借鉴依据，对照日常采编工作。

大众日报报业集团从2005年至2011年连续六年间八次获得一等奖，被称为“创造了奇迹”，在2012年又有消息、通讯、评论、摄影、专栏和网页等独揽7项中国新闻奖，2013年也有不少作品获奖，被业界称为“大众日报现象”。大众日报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有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报社形成了制造中国新闻奖的系列机制，“从一个好的新闻作品的选题、精雕到版面确保、社会反响等各个整个流程以及培育机制、奖励措施等方面都精心培育，运营出一个出精品、出人才的良好氛围。”⁶可见中国新闻奖评选标准不仅影响了媒体新闻生产的选题偏向，也渗透到其他的日常新闻采编细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将“制造”中国新闻奖作为组织目标，并成为普遍的操作逻辑和评判标准，固然有助于取得评奖的“好成绩”，但可能使中国新闻奖的功利化趋向更加严重，也可能窄化或扭曲新闻媒体的社会功

能。

（二）锦上添花，淡然处之

当前新闻业格局错综复杂，媒体性质交叠模糊，难以清晰分类。研究者所称的宣传性媒体、市场性媒体和专业性媒体也只是一种方便性表述，说明一家媒体身上哪一种倾向更加突出，而更复杂的情况是一个媒体内部宣传性、市场性或者专业性因素兼而有之，在宣传性媒体内部，可能也有专业导向的部门和新闻人，或者相反。在新闻实践中，有许多新闻人游走于宣传、市场与专业性活动之间，不仅呈现出多面性和强适应性，也有着专业自主性和文化自觉性，获奖对他们来说，是锦上添花。比如《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曾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2012年还获得长江韬奋奖），他对于获得中国新闻奖的观点是：

“中国新闻奖或者长江韬奋奖是体制内的、官方的最高奖。有的人说，这些奖你给我，我都不要。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觉得，获奖只能说明你符合评奖的标准，同时在参与评奖的人中你很幸运的取胜了，但并不能代表你比与你一起参评的人优秀多少，更不能代表在这个新闻界你的地位有多高。”⁷

可见，获奖者对获奖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还能对荣誉本身保持着批判精神。刘万永曾发微博质疑中国新闻奖评选标准：“评选条件特别死板僵化，如字数限制等，新闻界公认最好的报道从来无法入选”⁸，“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确实有好的报道，但多数一般。怎样提高代表性和公信力是重要的课题。”他因此建议“一个记者在写稿子的时候，衡量稿子的标准不应该是为冲击中国新闻奖而设立的，比如字数一定要在3000字以下，而应该是为了稿子本身，为了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如果为了拿奖而写稿，这个稿子不可能写得好。”⁹这提示同行，不要把外部荣誉变成工作动机和标准。这类话语也显示新闻从业者对待外部荣誉的淡定姿态和反思精神：试图不被外部荣誉“反噬”专业自觉和主体精神，同时，也是组织中的个体尽力调和宣传与专业价值的一种努力。

（三）疏离与不关心

新闻评奖具有仪式功能，仪式作用的机制是众人的参与和共同“凝视”，以强化归属感、提示行为规范和生成共同体意识。但在新闻业内，一年一度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并没有引起多少话题讨论。相较于普利策新闻奖揭晓后社交网络中讨论、学习的热烈，新闻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奖的揭晓显得冷淡，即使有关注也多是嘲讽、揶揄或对评选规则的批评。更多新闻从业者已不再关注这些奖项，似乎与己无关。不讨论、不关注和沉默以对，在这种犬儒和沉寂中，新闻评奖已然失落了应有的内化

与引领功能。

比如2012年第二十二届中国新闻奖、第十二届长江韬奋奖结果揭晓后，微博上并无明显的反响和讨论，有新闻学子在微博上请某老师对照普利策奖进行点评，老师的回复是“对这个奖真没有什么可说的，和普利策奖两回事”。在笔者的观察中，这是一种较为典型的看法和态度。而另一方面，面对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不少人又感叹“按照普利策标准，当下中国真是新闻富矿”。譬如一位微博博主说：

“有时想想不少普利策奖作品报道的事情才多大点事儿啊，若放在国内，普利策奖评委可终年不休地评奖，即使颁发普利策终身成就奖……普利策最高特别致敬大奖都不为过。”¹⁰可见，新闻社群对中国新闻奖的沉默，不是真正的服膺和无话可说，而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在缺乏身份认同和价值归属的新闻人中，失语和沉默意味着疏离和抗拒。有记者慨叹中外差距之大：“普利策新闻奖今天颁布了，中国新闻奖正在评。两者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那天跟记协的人说，要再这么评下去，很多记者会说，你玩儿你的，我们不和你玩儿了还不行吗？”¹¹

（四）可欲而不得：不平和愤懑

正如记者刘万永所说：“记者不要对结果有过高的期待，因为期待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如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反而很失望”，一些媒体单位和记者就遭遇这种可欲而不得的痛苦。《武汉晨报》于2013年8月推出“中国好兄弟”接力割皮救父重大典型系列报道，引起较大社会反响，该组报道也被推荐参评第二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但后因文本中存在“的、地、得”及标点符号使用错误，最终被拿下。在笔者的访谈中，该组报道的首发记者多次提及这次遗憾的落选，并告诫其他记者一定要遵循通讯报道“字数不超过3000字”、规范标点符号和语文用词等等原则。

新闻评奖是筛选出代表最高水准的新闻作品和从业者，为行业生成典范。但评奖失当和荣誉规则不公平则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果，其消极影响堪比惩罚。一些优秀的新闻作品，本可获奖，但最终因为人为因素和僵化的评选规则而落选，这不仅对于参评者是心理打击，也会激发专业共同体的怨愤感和消极心理，结果是强化新闻从业者之间的价值分裂，固化隔阂和荣誉界限。这种经历，也许广东卫视原《佳访》栏目制片人、主持人李佳佳体会最为深刻。2014年李佳佳凭借节目《罗昌平：实名举报 第一只螃蟹不好吃》参评中国新闻奖，在评选过程中该作品深受好评并候选一等奖，却因最后一关遭“举报”最终落选。落选后，李佳佳心情激愤，“被生生剥夺的痛苦”促使她撰文痛斥业界同行为了争夺“体制内单位拜若神明、与多

少领导政绩直接挂钩的”的奖项，不惜使用“厚黑齿冷”的手段。¹²此事发生后，最意味深长的是许多新闻人的反应，他们一方面表示同情和安慰，另一方面又劝告她本不应该去参评，“居然会在意这种有些南周和财新记者直言引以为耻的和谐大奖？”¹³

从新闻人对李佳佳事件的反应来看，在他们的认知和感受中，新闻荣誉域已经形成“默会的”甚至约定俗成的文化边界，一个行业“常规”。对于官方荣誉的“关系游戏”，许多新闻人将自己置身局外，不参与也不认同是自然的选择，李佳佳的参选反而是一个反“常规”的跨越荣誉域的贸然行为，落选并不意外。

对于“跨域”参评的动机，李佳佳解释说，“的确对体制内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奖项感冒不起来。但我真的在意，不是希望锦上添花，而是太需要雪中送炭。”“在势利又无奈的丛林里，得个体制内大奖，就不再会为生存挣扎。”¹⁴中国新闻奖这样的大奖，即使少有专业认同，在生存危机日益严重的新闻界，也是新闻人职业保障的重要砝码，因为它是实现体制内生存和进入权力体系的有效通道和象征资本。学者夏倩芳揭示了在媒体普遍的绩效考核和劳动商品化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如何早日脱离“挣工分”制度、摆脱“新闻民工”的身份是一个困扰新闻人的迫切问题。在普遍的生存危机中，进入体制内向权力靠拢寻求安全感成为许多新闻人追求的出路（夏倩芳，2013）。

（五）排斥与抗拒：视获奖为耻辱

对市场化程度较高、专业价值认同较强的新闻社群来说，对官方荣誉体系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比较普遍，但也有许多人表达排斥和鄙夷。《中国青年报》某记者说：“普通记者保持平常心，二逼记者追求官颁新闻奖，牛逼记者自己设立民间新闻奖。”¹⁵这虽是戏谑之语，却也道出了部分新闻从业者对待新闻评奖的认同所在。在第22届中国新闻奖揭晓后，原《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王某在微博上说：“热烈祝贺贵报再次幸免，未获得一项中国新闻奖。”¹⁶他还表示，“我只拿过南都新闻奖、南周年度传媒致敬和腾讯年度调查报道，没拿过中国新闻奖，不丢人。”¹⁷从类似话语中可感知，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旨归的传媒人对官方新闻奖持抗拒与排斥态度，而更服膺于新闻组织内部奖项，原因就是“内部奖”更专业、更体现业务水准，也值得尊重：连续举办了十多届的“南都新闻报道奖”就被赋予“南都普利策奖”的荣耀。¹⁸曾在南方报业集团任职的媒体人郭光东认为，“中国有追求的新闻人是不该追求中国新闻奖的”。¹⁹可见在部分新闻人眼中，获得中国新闻奖并不是荣誉，这些新闻人在专业荣誉的认同方面与官方新闻奖之间存在着巨大价

值鸿沟。一个例证是,以坚持实践新闻专业主义著称的胡舒立团队,曾做出众多引起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的新闻报道,多次斩获国际新闻界公认的大奖,但却从未获得过中国新闻奖。这本身就使新闻行业内荣誉域分立的现象问题化,凸显国内主导性荣誉体系与专业荣誉在荣誉法则上的鸿沟。

荣誉域的形成有其制度基础,但主要是基于认同、尊重和团结等主观心理机制,荣誉域分裂最根本的原因是价值分歧。这种价值分歧给新闻人带来许多困惑,有记者意识到,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其实就是新闻和宣传两种不同话语体系在猛烈撕扯、频繁切换,正是这种不确定感和价值困境造成记者“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错位,无法使新闻工作者保持持久的职业忠诚度(赵云泽,2014;张志安,沈菲,2012)。

三、专业荣誉制造及其困境

正是由于荣誉界限的存在,促使专业新闻工作者创造自己的荣誉,在官方宣传的价值标准之外另辟别途,寻求体认专业社区价值和新闻理念,加强认同和团结(周海燕,李静姝,2012)。近年来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南方周末》曾经举办的“中国传媒年度致敬”、《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内部奖项“南都新闻报道奖”以及一些互联网公司举办的传媒盛典等等。

南都新闻奖被誉为南方报人的“普利策奖”。该奖项是“对南方都市报文字、图片、版面以及它们所代表着的思想、艺术与影响力的一年一度的回味与巡礼”(张超,2007),从2005年开始举办。它以是否符合南方都市报的采编理念和要求作为最根本评判标准,将最具闪光、最具价值和最具示范意义的作品评选出来,而不搞平衡照顾,更无必要“排排坐分果果”(范以锦,2007)。在评选过程中,完全做到公正公开,尊重最后投票结果,“部门利益”、“关系平衡”等超出评奖原则的纷争基本上没有出现(庄慎之,2007)。因此,“南都新闻奖”受到许多新闻从业者关注和认同,被视为专业标杆。近年来,互联网传媒组织也纷纷设置机构奖项,向每年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的新闻从业者致敬。腾讯网从2008年开始举办“年度华语传媒盛典”,由业界与学界专家共同组成的评委会,评选出年度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作品及从业者。网易、新浪等互联网传媒公司均设有年度传媒奖项,这些评奖越来越受到业界与社会的瞩目。

这些新型的荣誉体系产生于新型的新闻专业实践之中,构建出有别于宣传话语的职业荣誉法则,表现在从奖项设置、评选标准、评选流程、评委会组成等方面与

官方荣誉体系不同,更加注重专业性。这套新型的职业荣誉体系,就其规模、行政规格或者“级别”而言,无法与中国新闻奖等官方荣誉相提并论,也不一定能转换为物质利益和权力资源,却能让获奖者享有来自职业社群的赞美性尊重和认同,正是这种尊重与认同才构成了一个荣誉的核心,有助于凝聚一个共享性的专业社区,共同推进新闻事业。“南都新闻奖”将普利策奖视为参考标准,既是“南都人一次苦中作乐的自我激励”,“也是一种内部文化”,反映了很高的自我期许。其意义正如原《南都周刊》总编辑陈朝华所言:“南都新闻奖跟我曾经看过的任何一个颁奖典礼都不一样,大家都在反省,都在呼吁,都在谏言”。²⁰通过这些新型的荣誉机制的实验与创新,专业新闻人希望达成价值共识,并团结职业共同体,以先行于体制之坚持达到改造新闻业的愿望。

荣誉是一种可分配的象征资源,也是一套携带权力关系的实践话语。在命令型新闻体制和宣传事业原则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不同荣誉域的存在及其分歧不利于控制者的同一性编码、意义争夺和思想规训。谁有权设奖、谁能授奖、谁有资格被“加冕”成为一个权力主导和控制性的问题,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官方荣誉制度被赋予国家治理和政治控制的功能。2003至2005年政府部门对新闻系统评奖情况进行过全面清理整顿,使原有的14个全国性新闻评奖整改缩减至2个,即以中国新闻奖和长江韬奋奖为核心统领整个新闻行业的荣誉生产与分配,同时巩固了中国记协和宣传主管部门对职业荣誉的主导性和控制权。

近几年来,“技术迭代与政府管控共同塑造了当下中国舆论场上的国进民退潮”(元淦恭,2015),宣传管理趋紧,新闻操作空间日益逼仄。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集中反映了宏观的宣传体制与具体新闻业务之间的“默会”边界变得更加脆弱。《南方周末》新年特刊于2001年创办,曾主要包括“新年献辞”、“年度人物”、“年度传媒致敬”等板块。其中,“新年献辞”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望,“年度传媒致敬”在传媒圈内广受认同,这些“致敬”、“盘点”与评选活动既是媒介面向社会的荣誉生产,也是对新闻专业社群的自我认同和“加冕”。到2011年,《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被“再三命令”不允许设置“年度人物”和“年度传媒致敬板块”,“年度好新闻”、“年度国内外事件”、“年度人物评选”等栏目也被撤销²¹。腾讯网自2008年始每年举办传媒盛典,在专业记者圈内影响日益扩大。2015年11月腾讯网年度传媒“荣耀之夜”颁奖典礼上,《新京报》关于天津滨海新区爆炸系列报道获得“年度突发事件报道大奖”、财新记者王和岩获得“年度记者奖”,新闻作品《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获得“年度特稿奖”,这些消息迅速在网络

上传播开来,广受社会瞩目,但是迅即被删除,腾讯网的评奖受到管理部门质疑和干预。

四、荣誉控制与“承认”政治

荣誉的生产和分配是控制性的,对荣誉的控制就是对权威和象征资本的确认和控制。荣誉规则贯穿着“竞争”和“加冕”的权力实践以及主体之间“施”与“受”的权力运作,在荣誉运作的过程中,主体的位置和秩序被分配、确认并且固化,规定着谁有权控制荣誉、地位和象征资本的分配权。通过这种周而复始的荣誉生产和仪式过程,权力支配者的权威与力量得到宣示和巩固。

政府奖项不仅是官方意识形态机制,也是国家吸纳的机制。专业新闻人所面临的荣誉困境是:国家主导性荣誉既不认同他们的实践,也限制或拒绝他们形成、张大自身的荣誉空间和社会影响力。在传统媒介普遍式微、新媒体前途未卜的当下,专业共同体面临这样的选择:融入国家与市场的联姻,还是放逐于“游牧”的命运并寻找新的逃逸路线(比如投身于新媒体实践)(黄月琴,2015),或者坚持抱团取暖,以持续的专业实践和自足的主体性抵御权力的支配、吸纳和收编。

从新闻事业改革的历史轨迹来看,国家对市场化新闻业的态度和初衷是出于解决实际的财政困难,促使新闻业走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新闻的专业性或职业化并不是其预定的或既有制度设计的目标,而是一个实践衍生和催化的结果。面对市场化媒体和专业新闻的崛起和挑战,政府囿于管控意识,缺乏对这一结果的正视和体制性“承认”(recognition)。

“承认”是一个政治学概念,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其源头可追溯到德国古典哲学家费希特和黑格尔。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哲学家和批判学者阿克塞尔·霍耐特、查尔斯·泰勒和南希·弗雷泽对承认政治议题的集中讨论,“承认”一词在政治和社会哲学领域广受关注。将“承认”政治的视角引入新闻传播研究,有助于超越物质、经济利益层面和技术视角来理解当下的新闻业,有助于深化对荣誉问题的理解。承认是个体要求在主体之间和在社会制度中反映其尊严、认同和利益,“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的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泰勒,1994/2005:290-291)。承认可分为个体与全体之间的承认和个体与社会制度之间的承认。作为一种道德紧张关系,承认扎根在社会关系之中,社会主体之间、主体与制度之间为了承认而进行的斗争产生一种内在的社会压力(霍耐

特, 1992/2005), 并蕴含变革社会的能量。在霍耐特的视域中, 承认的三种形式(即情感关怀、法律承认、社会尊重或团结)对应着自信、自尊和自豪三种实践自我关系, 反之则存在着强暴、剥夺权利、侮辱等蔑视形式(陈良斌, 2015: 序40-41)。霍耐特认为, 在制度与人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 对合理的承认要求的蔑视, 不论其形式如何都构成了社会压迫, 而所有的社会行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承认而斗争(霍耐特, 1992/2005: 177)。社会学者应星依据中国本土情境与传统文化, 将承认政治发展为“气”与抗争政治, 并与底层人的尊严、情感、道义和生存伦理问题密切关联起来, 从而提供了一种超越理性、利益与权利的单一层面去认识中国社会问题的综合视角(应星, 2011)。在新闻和媒体领域, 围绕着认同、价值和职业尊严等问题而展开的承认政治正在凸显(黄月琴, 2012), 而这一问题与荣誉体系的构成和运作直接相关。也就是说, 荣誉问题实际上是承认与“气”的政治在新闻业领域的具体表现与象征形式。

五、评奖改革与荣誉共同体的构建

官方新闻奖在荣誉实践中, 演变出迎合、疏离与抗拒等几套实践逻辑, 形成体制内外共生而又分立的话语系统和荣誉域, 新闻业陷入“表达与实践相分离”(黄宗智, 2005)的局面。从长远来看, 这不利于新闻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共识凝聚, 也不利于新闻业的健康发展与整体推进。

首先有所行动的是中国新闻奖的改革。事实上, 每逢中国新闻奖评选之际, 有关新闻评奖改革的呼声不断, 专家学者、新闻工作者都在呼吁改革弊端重重的现行评奖机制, 呼吁弥合传媒专业裂痕, 改善职业生态。比如一些新闻工作者对评奖制度中如字数限制等规则多次提出质疑, 认为新闻实践社会生活复杂, 拥有数万言的报道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王大龙, 2003; 范以锦, 2007)。2014年, 担任第23届中国新闻奖评委的唐绪军, 在评选结束后写下《中国新闻奖也须“走转改”——改革中国新闻奖评选机制建言》一文。他认为, 中国新闻奖应该敬畏“中国”这两个字, 应该尊重“新闻”这个职业, 真正把那些能够展示“我国新闻工作年度业绩”的作品评选出来, 使之成为全国新闻工作者学习的范本, 并且在国际交往中能够毫无愧色地代表中国新闻业的职业水平。他还建议在新闻评奖改革中, 对评选机制进行一些技术性改进, 从作品报审到最终评选, 都应将新闻院校专业教师吸纳到评选机制中来, 增加高校提名, 平衡优化评委会成员结构, 从专业视角出发, 评选出学界和业界公认的优秀作品(唐绪军, 2013)。

在2015年中国新闻奖的初评中,评委会确认“已经启动媒体融合趋势下中国新闻奖奖项设置调研,力争提出更好遵循新闻传播规律、适应媒体融合趋势、符合媒体发展和新闻事业发展实际的奖项设置方案。”²²中国新闻奖评奖规则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增加了“他荐”与“自荐”两个参评渠道:全国记协指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为代表的11所新闻院校和科研单位,作为中国新闻奖的学界试点报送单位,可直接向中国记协报送参评作品²³(每个单位报送作品不超过3件,其中该单位所在省(区、市)媒体刊播作品不超过1件),此为他荐;自荐就是新闻工作者不需经过媒体组织的推荐和报送而自主向评委会推荐自己的作品,“为了拓宽报送渠道,避免好作品错失参评机会,中国记协全面放开自荐参评。把原来将自荐参评的作品交由相关报送单位审核后占用名额推荐,改为由评奖办公室直接受理”²⁴。在2014年和2015年的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中,实际均包含了“他荐”与“自荐”渠道的作品。

将部分新闻院校纳入评荐资格范围,反映了评奖机构对荣誉生产规则的调整和对荣誉共同体有限扩大的意图。在中国新闻奖的评委结构中,来自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仅占总评委人数的12%左右,难以对新闻评奖的标准和结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新闻教育工作者倾向于认同专业主义新闻价值,对新闻作品的评判更加强调新闻品质和实际的社会影响。近年来,各级宣传部与新闻教育院校合作的“部校共建”运动在国内全面展开,将这些指定院校(多数是“部校共建”院校)的推荐纳入中国新闻奖的荣誉生产将有助于弥合宣传与专业荣誉域的疏离和裂痕,对新闻荣誉实践的改善应能发挥积极影响。

增加“自荐”渠道则是评选机构对中国新闻奖陷入媒介组织官僚游戏的批评的回应,以去科层化和去组织化的方式吸纳个体角逐荣誉的可能性,增加个体参与荣誉规则的自主性,从而扩大荣誉共同体范围。增加“自荐”渠道有利于调动都市类媒体的新闻工作者参与评奖的积极性。但无论是“他荐”,还是“自荐”,中国新闻奖的改革是技术性的变化,是增量变化,因此它与专业新闻社群之间的价值裂痕依旧会存在。不过改革与变化并非毫无意义。

短时期看,一个整合和跨越性的职业荣誉共同体的形成仍然是困难的。作为掌握权力和行业资源的一方,国家新闻主管部门的施动角色至关重要,在积极改革官方荣誉奖项的同时,应约束自己的行政权力,尊重新闻界的自主和自律性,以开放包容的态度对待专业荣誉的生产,促使新闻界形成自主生长、多元竞争,并逐渐走向认同和团结的荣誉体系。

构建一个基于承认的荣誉共同体是加强新闻界的团结与合作的必要路径,其前提是理解并正视专业荣誉的生成,在体制上予以确认其正当性。在一定意义上,团结建立在一种对话与承认的关系之上。承认的核心因素在于:物质资源的分配、利益的表达和文化价值秩序的承认(Fraser & Honneth, 2003; 汪行福转, 2006),承认政治实际上是平等政治,也是尊严政治(泰勒, 1994/2005)。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在制度上公正有效地提供对社会参与者的劳动和权利的承认,或者一个行业将大批从业者排除在主导性荣誉体系之外,它就必然构成一种“气”的政治。要求承认就是要求其他主体、制度和国家对其社会地位及受尊重程度给与深刻而持续的关注,正如黑格尔所说:应当根据我们的社会认同及职业,恰如其分地对待我们(阿皮亚, 2010/2011: 3-4)。在政治与社会生活领域,应该把“承认的政治学”提高到与“团结的政治学”并重的高度(应星, 2007)。

团结得以可能的一个重要条件是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的形成(涂尔干, 1893/2000)。集体意识是社会成员平均具有的信仰和感情的总和,以及构成他们自身的明确的生活体系。依靠荣誉法则、观念惯习和文化传统,共同体成员形成一种相同的情感类型,这种情感类型反过来作用于共同体,使之思想和行动具有相似性,这就是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在集体意识的基础上,最终形成社会生活的总体道德规范。因此荣誉是集体意识与道德情感的集结和承载物,拥有共同的荣誉意味着对光荣与耻辱的共同体认和规范性遵从。一个荣誉域分裂、对立或者互斥的行业,无法形成团结互助,相互砥砺和相互尊重的集体情感与意识,也无法产生共同的信仰和道德伦理,而必然陷入内部撕裂、人才流失和自我耗竭的困境。扩大荣誉空间,构建一个基于主体之间、主体与制度相互“承认”的荣誉共同体应是破除这种困境的必要思路。“改变荣誉的基础,就会产生道德革命”(阿皮亚, 2010/2011: 169),一场“荣誉革命”或许是解决新闻界种种顽疾和促进新闻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途径。

(责任编辑:李艳艳)

注释 [Notes]

1. 1954年,瑞典文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但萨特却发表声明拒绝领奖。他认为作家所获得的一切荣誉都会使自己及读者产生压力,会使作家被牵扯进组织当中。检索于http://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4190。
2. 中国新闻奖评选面对面第八期.评选工作答网友问(2015).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9/25/c_134658557.htm。

3. 精品产生的背后——一位中国新闻奖评委参评感言(2013).检索于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5/04/c_115637602.htm.
4. 赵秀富(2012).参加中国新闻奖评审的几点感想——在中国有色金属报记者大会上的书面发言.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b6916c0102dycl.html.
5. 中国新闻奖离我们有多远? 检索于<http://www.xici.net/d42295765.htm>.访问于2015年10月20日。
6. 精品产生的背后:一位中国新闻奖评委参评感言(2013).检索于http://www.cq.xinhuanet.com/2013-05/04/c_115637602.htm.
7. http://weibo.com/1665826811/zvEE27ngy?from=page_1003061665826811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张志安,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0日。.
8. http://weibo.com/1497616314/AjjqVf3Kk?from=page_1005051497616314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刘万永,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0日。
9. 同上。
10. http://weibo.com/2552430125/yf1mJhSs0?from=page_100505255243012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政治传播系, 访问日期2015年9月20日。
11. http://weibo.com/1497616314/3f4ddFcKxT?from=page_1005051497616314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 @刘万永, 访问日期2015年11月10日。
12. 李佳佳(2014).一篇中国新闻奖一等奖作品被新政拿掉的前后.检索于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48813e0102v2yg.html.
13. 同上。
14. 同上。
15. http://weibo.com/1654168963/zx7yzhOrD?from=page_100505165416896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_rnd1448003746302.访问日期2015年9月25日。
16. http://weibo.com/1660141095/z20sSoBDo?from=page_100505166014109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访问日期2015年9月25日。
17. 同上。
18. 江艺平(2014).和行动者站在一起.见江艺平为宋志标《旧闻评论》网络版合集所作序言。
19. http://weibo.com/1236382915/BIX0zutvC?from=page_1005051236382915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访问日期2015年9月25日。
20. http://weibo.com/1282282193/yaC3H8xhl?from=page_1005051282282193_profile&wvr=6&mod=weibotime&type=comment.访问日期2015年9月12日。
21. 南方周末编辑部(2013).南方周末编辑部就2013年“新年特刊”出版事故的说明.检索于http://www.hrol.org/News/ChinaNews/2013-01/3297_7.html.
22. 中国新闻奖评选面对面第四期:评选项目(2015).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5/07/c_134217184.htm.
23. 中国记协印发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2014).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

zgjx/2014-12/30/c_133886602_4.htm.

24. 中国新闻奖评选面对面第八期:评选工作答网友问(2015).检索于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5-09/25/c_134658557.htm.

引用文献 [Reference]

- 阿皮亚(2011).《荣誉法则:道德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苗建华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 [Appiha, K.A. (2011). *The honor code: how moral revolutions happen (Trans)*. Beijing: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10).]
- 艾尔菲·艾恩(2006).《奖励的惩罚》(程寅,艾斐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 [Kohn, A. (2006). *Punished by rewards (Trans.)*. Shangha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3).]
- 埃米尔·涂尔干(2000).《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
- [Durkheim, E. (2000).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893).]
- 包临轩(2000).中国新闻奖改革势在必行——兼谈普利策新闻奖的启示.《新闻传播》,(1),12-14.
- [Bao, Linxian(2000). Imperative and necessary reform on China Journalism Awards——a discussion about lessons from the Pulitzer Prizes. *News Communication*, (1), 12-14.]
- 查尔斯·泰勒(2005).《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译),选自《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
- [Taylor, C. (2005).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4).]
- 陈良斌(2015).《承认哲学的历史逻辑:黑格尔、马克思与当代左翼政治思潮》.北京:人民出版社.
- [Chen, Liangbin(2015). *The historic logic of recognition philosophy: Hegel, Marx and the contemporary left-wing political thoughts*. Beijing: People Press.]
- 范以锦(2007).南都新闻报道奖的理念、价值及启示.《南方传媒研究》,(7),16-18.
- [Fan, Yijin(2007). The idea, value and inspiration of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News Awards.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7), 16-18.]
- 傅剑锋(2010).对新闻职业共同体的愿景.《南方传媒研究》,(26),20-27.
- [Fu, Jianfeng(2010). The vision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community.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26), 20-27.]
- 福柯(1999).《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
- [Foucault, M. (199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5).]
- 高德胜(2009).奖励的本质与滥用的后果.《教育科学研究》,(6),18-21.
- [Gao Desheng(2009). The nature of rewards and the consequence of abusing.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6), 18-21.]

霍耐特(2005).《为承认而斗争》(胡继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Honneth, A. (2005). *Kampf um Anerkennung* (Tran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2).]

黄顺铭(2013).官方职业荣誉的机会结构——对全国好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的比较研究.《新闻记者》,(4),45-50.

[Huang, Shunming(2013). Structure of the official professional honor——comparative research about National Good News Awards and China Journalism Awards.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4), 45-50.]

黄顺铭(2014).制造职业荣誉的象征:中国官方新闻奖的制度实践(1980-2013).《国际新闻界》,(6),29-45.

[Huang, Shunming(2014).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honor: institutional practice of official journalism awards in China (1980-2013).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6), 29-45.]

黄月琴(2012).社会运动中的承认政治与话语秩序:对厦门“散步”事件的媒介文本解读.《传播与社会学刊》,(20),79-114.

[Huang, Yueqin(2012). 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and discourse order in social movement: media interpretation of the “Walking” Event in Xiame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 79-114.]

黄月琴(2015).象征资源“褶皱”与“游牧”的新闻专业主义:一种德勒兹主义的进路.《国际新闻界》,(7),53-71

[Huang, Yueqin(2015). The fold of symbolic resources and nomadic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 Deleuzism approach.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7), 53-71.]

黄宗智(2005).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1),83-93.

[Huang, Zongzhi(2005). Understanding China: social science that starts from practic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 83-93.]

克利福德·格尔茨(2008).《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Geertz, C. (2008).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selected essays* (Trans.). Nanjing: Translation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兰德尔·柯林斯(2009).《互动仪式链》(林聚任,王鹏,宋丽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Collins, R. (2009).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s* (Trans.).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4).]

兰维,高德胜(1997).略述国外关于强化、奖励和内在动机关系的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2),49-54.

[Lan, Wei & Gao, Desheng(1997).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reinforcement, rewards and inner incentives in foreign country.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Experiment*, (2), 49-54.]

欧文·戈夫曼(2008).《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Goffman, E. (2008).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Tran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59).]
- 唐绪军(2013). 中国新闻奖也须“走转改”——改革中国新闻奖评选机制建言.《新闻战线》,(11),33-36.
- [Tang, Xujun(2013). China Journalism Awards also need changing——suggestions for selection mechanism of China Journalism Awards. *Journalistic Front*, (11),33-36.]
- 汪行福(2006). 从“再分配政治”到“承认政治”? :社会批判理论的范式之争.《天津社会科学》,(6), 11-15.
- [Wang, Xingfu(2009). From redistribution politics to recognition politics?: the argument about the paradigm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 *Tianjin Sociology*, (6),11-15.]
- 王大龙(2003). 新闻评奖工作环顾与反思.《新闻记者》,(9),10-12.
- [Wang, Dalong(2003). The review and reflections on selection of news awards for journalistic reports.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9),10-12.]
- 夏倩芳(2013). “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劳动、产品与新闻人.《现代传播》,35(9),28-36.
- [Xia, Qianfang(2013). The politics of earning work points: products, work, and journalists under the performance system. *Modern Communication*, 35(9),28-36.]
- 应星(2007). “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开放时代》, 2007(6),106-120.
- [Ying, Xing(2007). Emotion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actions in China. *Open Times*. (6),106-120.]
- 应星(2011). “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Ying, Xing(2011). *Emotion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Beijing: Sociology Literature Press.]
- 元滢恭(2015). 网络舆论场五年变身记.《博客天下》,(1),42-47.
- [Yuan, Gangong(2015).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field within five years. *Blog weekly*, (1),42-47.]
- 张超(2007). 为什么要设立南都新闻报道奖?——与庄慎之对话.《南方传媒研究》,(7),43-46.
- [Zhang, Chao(2007). A conversation with Zhuang Shenzhi: reasons for establishing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news awards.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7),43-46.]
- 张志安,沈菲(2012). 调查记者的职业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4),64-75.
- [Zhang, Zhian & Shen, Fei(2012).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job satisfaction and its predictors.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64-75.]
- 赵云泽(2014). 记者职业地位的殒落:“自我认同”的贬斥与“社会认同”的错位.《国际新闻界》,(12),84-97.
- [Zhao, Yunze(2014). The decline in the occupational status of journalists: depreciation in self-identification and the mismatch in social-identification. *Chinese Journa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12), 84-97.]

周海燕,李静姝(2012).策略与分野:在新闻专业主义话语与国家话语之间——基于《南方都市报》新闻报道与“中国新闻奖”的研究.《新闻记者》, (8), 18-23.

[Zhou, Haiyan & Li, Jingshu(2012). Strategy and divergence: the study built on news coverage of South Metropolitan Daily and China Journalism Awards between the discourse of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and state discourse. *Shanghai Journalism Review*, (8), 18-23.]

庄慎之(2007).2006年度南都新闻报道奖评审内幕揭秘.《南方传媒研究》, (7), 19-38.

[Zhuang, Shen zhi(2007). The inside stories of choosing news coverage for Southern Metropolis Daily News Awards in 2006. *Southern Media Research*, (7), 19-38.]

Fraser, N. & Honneth, A. (2003). *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 a political-philosophical exchange*. New York: V